

力防堵，“夷夏”防线总算没有马上崩溃。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清王朝的急剧衰败乃至灭亡，西学东渐的大门才被完全打开。

[参考文献]

[1]潘耒. 晓庵遗书序[A]. 遂初堂集:卷六[M]. 清刻本.

[江晓原(1955—),男,上海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

[2]王锡阐. 晓庵新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黄伯禄. 正教奉褒[M]. 上海:上海慈母堂,1904.

[4]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江永. 数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阮元. 畴人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7]赵翼. 檐曝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西学经典翻译与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王晓朝

(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4)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进入北京传教,由此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热潮,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页。一般说来,中国历史学者不会将早期耶稣会进入中国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国在近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欧洲看来,早期耶稣会进入中国,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史上,在欧洲全球扩张史上,以及在近代中国初期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1](P3)}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惊叹这场西学东渐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科学、宗教、神学、外交关系和经济交往等方面内容的递次呈现,令我们对这场文化交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赞叹不已。前不久,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参加“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数十篇研究论文进一步加深了笔者的这一印象。

那么,在这场最早开始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自早期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的西学东渐引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以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态度,这就是这场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中国近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的生成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一文化交流的场景中,早期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激励要素,经过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遇与碰撞,催生了中国近现代理性思维方式。

翻译与诠释东西方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和皈依天主教的儒生士大夫的一项主要精神劳作。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因为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质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

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念。”^{[2](P485)}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需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方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2](P483)}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文化传统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理性思维方式,而且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上,西方学术界有所谓“语言决定论”的观点,即认为思想被语言所决定。语言决定论者指出,正是人们所能言说的东西,限制并建构了人们所能思想的东西。语言形式不仅是可传达性的条件,而且首先是思想之观念化的条件,不存在任何无语词的纯粹思想。任何超越情绪与感觉的思想,即任何可以称之为概念和观念之反思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人们碰巧所使用的那种具体语言。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人们所可能思想的哲学问题。一个人的思想形式被他无意识的语言文化模式的无情法则所支配。例如,西方人关于时间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在印欧语言动词的三时态系统中进行,甚至牛顿式的空间、时间与物质也决非直觉,而是来自文化与语言。这种语言决定论本身是否正确,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提醒我们:语言的特点与思维方式的特点密切相关。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分析思想和思维模式

的特点。

从比较的眼光看,如果说使用系动词“是”是西方语言的最大特点,那么,中国传统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缺少“是”。这样说并非带有任何褒贬之意,而只是为了阐明西方语言与古汉语的差异。张东荪曾倡导在对中西文化作研究时要比较,不要比附。他在比较了中国古汉语和西方近现代语言之后指出了古汉语的四个特点:“第一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使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观念;第二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使谓语亦不成立;第三点是因为没有语尾,遂致没有时态与语气等语格;第四点是因为因此遂没有逻辑上的‘辞句’(proposition)。”^[3](P461)]他说:“总之,中国言语构造上有时可以没有动词,而所有动词又没有可作正式缀词的,以致正式的名学辞句无法显明成立。因为照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名学讲,缀词是必要的。”“因此我可敢断言:中国人的心思根本上是‘非亚里士多德的’。至于白话文上有‘是’字,或许是后来的进步。”^[3](P471,472)]通过对明末清初文献中的“是”字含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化,也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本体论思想的发展。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促成了汉语“是”字从用作实义动词转化为以系动词用法为主的重大转变,为汉语的变迁和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异质的文化要素,使西方文化的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扎了根。它是中国传统语言和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

[王晓朝(1953—),男,安徽省桐城市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和宗教学研究。]

变化的前奏。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后延伸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就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白话文)正是中方吸取了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要素以后生成的。自20世纪的白话文运动至今又过了近一个世纪,汉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4]所以我们说,正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促成了中国人原有语言和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为古汉语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卜正民(Timothy Brook). 早期耶稣会与明末疆界:中国人寻求和解之道[A]. 卓新平. 相遇与对话[C].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 [2]麦金太尔. 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3]张东荪. 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A]. 宋继杰. 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 [4]邓晓芒. 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国旅行[N]. 中华读书报,2004-02-18.

西学东渐:晚清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被迫从封闭走向开放,而西学东渐则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大量西学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促动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知识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以经史子集为基干,科举考试更是只考儒家的四书五经。因此,对于传统的士子来说,除了“帖括词章”之外,就没有其他“学问”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教会学校、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的设立,人们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原因在于新式学校不同于旧式学堂,它除了传统的中学课程外,还

开设许多近代西学教育课程,如数学、几何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力学、重学、热学、物理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农艺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哲学、外语,等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西学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西学课程在整个教育课程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逐步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西学主导型课程结构。据对上海已知课程门类的38所新式学堂的研究,有37所学堂的西学课程门类超过了中学课程门类^[1]。这些西学课程的教材,或取自西方,直接采用西方原版书或翻译的书,或由任课的西人教习自编。教育课程